

28.01

城关文史資料選輯



55年

輯

第

yt199/35

城关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
城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月

封面设计：高凤鸣

封面题字：李正德

城关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城关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兰州民族印刷厂

工本费：2.00

前 言

《城关文史资料辑》是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关键性的重要时刻和金城各界人民满怀豪情欢欣鼓舞地准备庆祝兰州解放四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出刊的，这个辑子的刊出。同样也标志着我会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在中共兰州市城关区委的亲切关怀下和有关各方大力支持下，经过探索、整改，逐步走上正规，向日臻完善迈进了一步。

我区位居兰州市中心，是省、市领导机关和中央驻兰单位聚居之处。人文荟萃，史实丰富，早在五十年代起，有关专业机构就从事研集、撰写兰州史料。特别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更是广征博采，多说并蓄，宏卷巨著，相继飨世，但多其军事、政治等茕茕大者。

至若千行百业之兴衰沉浮，人文风土之坎坷变迁，远未发掘详尽。我会有关于斯，本着追根究源，拾遗补缺之精神，征集到一批颇具价值之史料。经过整理审定，其中部份以简报形式分篇印发。有的推荐省市或由报刊转载。有的和省内外兄弟单位进行交换。但终感参阅零散，保存不便，现在集零为辑，并逐一核勘校补，力求翔实，以为嗣后努力之肇端。

水平所限，遗误难免，敬希读者指正，不胜感荷！

目 录

前 言

城关区概况 (1)

王世相与“公车上书” 王勤业 王勤成 (6)

蒋介石莅兰与兴隆山招待所 周霁青 (11)

追述祖父马朝选解放时轶事 马耀超 (16)

刘郁芬在甘二三事
..... 马连贵口述 马玉祥整理 (21)

蒋胡进犯延安前之序战
——陇东西华池战役的回忆 陈定行 (23)

对解放大西北“和平宣传团”的回忆
马福堂口述 马耀超整理 (31)

回忆抗日战争中大刀队杀敌两记 周霁青 (36)

兰州火药库爆炸亲历记
马福堂口述 马耀超整理 (39)

我参加沙家店战役中一次战斗的回忆
李绪珠口述 张玉凤整理 (41)

金城“中正山” 刘亚之 (46)

- 兰州中山林的兴废 刘亚之 (55)
解放前兰州城关区水利事业回顾 莫亚吾 (59)
记五泉山水磨 莫亚吾 (66)

- 解放前兰州中医概况 周勤青 (68)
兰州积善针灸馆——大崇祥号 张恒德 (75)

- 兰州著名风味小吃——马保子清汤牛肉面
..... 市民建供稿 李正德整理 (78)
兰州名产醉瓜 吊蛋儿 杨君栋 (81)
解放前兰州的粮行斗市及小磨业 张福亭 (83)
兰州的私营皮货业 市民建供稿 李正德整理 (87)
兰州水药业 王警初 (93)
忆兰州的交通旧貌 张福亭 (103)
昔日兰州的“东方木厂” 耀超采集 (116)

- 兰州佛教协会梗概 张恒德 (119)
兰州西关清真寺 马 喻 (125)
兰州桥门清真寺 马 喻 (130)
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在兰州 张子虔 (133)

城关区概况

兰州市城关区是甘肃省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是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也是西北地区经济、交通、信息枢纽，兰州市的中心区。

城关区位于兰州市区东部，地跨北纬 $35^{\circ}57'50''$ — $36^{\circ}09'32''$ ，东经 $103^{\circ}45'37''$ — $104^{\circ}00'00''$ 。西与安宁、七里河两区接壤；东与榆中县相连；南与榆中县、七里河区毗邻；北与皋兰县搭界。东西长20.02公里，南北宽10.06公里，面积220平方公里。1987年底常住人口58.7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占91.2%。有汉、回、满、藏、蒙古、东乡、撒拉、维吾尔等33个民族，汉族占94.9%，少数民族占5.1%。其中主要是回族，约三万人。

城关区地处兰州盆地东端，地貌属河谷盆地型，南北两山对峙，黄河横贯盆地。海拔1500米—2100米，最高点三台阁海拔2129米，最低点北面滩海拔1503米。气候干燥，降水稀少，且蒸发量大，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属于甘肃中部干旱地带，为温带草原气候类型。年平均无霜期170天，平均气温9.1℃。最冷月（元月）平均零下6.9℃，最热月（7月）平均22.2℃，日温差平均13.5℃。年降水量平均327.7毫米，多集中在秋季。冬暖夏凉，是理想的避暑盛地。

全区地形分为山、坪、川三类：南有皋兰山、将军山、

罗汉山，北临九州台、白塔山及徐家山，成为兰州的自然屏障，也是市区绿化的重点和游览地；大沙坪、伏龙坪、桃树坪、古城坪、白道坪等二级阶地为工厂、居民和农业区；河川地带主要是街区分布，重要的工业建筑及部份农业用地。黄河自西向东，蜿蜒奔流20公里，注入皋兰峡，再北折而入榆中、皋兰县境，为全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城关地区历史悠久。远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有原始人类定居，繁衍着母系氏族的华夏先民。夏商时属雍州地，西周为西羌地，秦属陇西郡，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置金城郡并金城县，本区地属金城县。东晋时北魏改县为子城，西魏时将金城郡治迁至子城，为今城关区内建置之始。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郡改州，置兰州总管府、府治子城，“兰州”之称即始于此。据《元和郡县志》谓：兰州“取皋兰山名”。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复置金城郡，改县仍名金城。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改县曰五泉。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改县为兰泉。元称兰州，属巩昌路。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降兰州为兰县，属临洮府。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复升为州，仍属临洮府。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设兰州卫，属陕西布政司。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甘肃与陕西分治，设甘肃行省（即甘肃布政司）。甘肃巡抚由巩昌迁至兰州，兰州始为甘肃省会。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将甘肃政治中心由临洮迁至兰州，改称兰州府，始置皋兰县（今城关区）。辛亥革命后，几经更名，至1941年7月正式成立兰州市，与皋兰县同治于今城关区。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建立了兰州市人民政府，本

区遂发展为县级行政区。

解放前兰州是一个落后的消费城市，城区面积仅2.39平方公里，人口10余万，城内都是狭路小巷，仅有七、八条土路和碎石路；城外是村庄、果园、农田、坟滩及义园。全市没有自来水、公共汽车和铁路，没有一幢象样的公用建筑。工业粗呢毛毡、火柴、制革等十来个小厂外，大部分为水蒸坊等手工作坊。农业只有沿河一部分耕地采用水车和城南果园，利用泉水灌溉外，主要靠天吃饭。耕作全凭人工畜力，无一部农机设备。城区仅有大学一所，中专中师6所，中学7所，小学32所。公办、私立和教会医院共5所，病床不足四百张。破旧的影剧院7所。商店、银行、钱庄多在酒泉路、张掖路、中山路、庆阳路、临夏路一带。

解放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关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除对旧城区的街巷进行整修外，新开拓了20多条宽阔的柏油马路，新建了不少居民区，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街区面积扩大了十倍左右。全区207条街巷，已全部铺筑了沥青或水泥路面，供电、供水、排水、水冲式公厕、道路绿化等，各种公共福利设施相继配套。张掖路、酒泉路、庆阳路、天水路、东岗西路等地都是全区主要的商业街道。东方红广场南侧矗立着统办一号、二号两幢十四、十六层大楼，北面建有最现代化的科学宫，西面建有甘肃最大的能容纳六千观众的体育馆。中心广场、盘旋路和火车站广场花团锦簇，浓荫蔽日，是人们散步游憩、纳凉、观赏的市内花园。区内交通极为方便，现有15条公共汽（电）车线路，每天有180多辆公共汽（电）车，数百辆“招手停”和出租小卧车往返不断；高大宏伟的兰州火车站是兰新、兰青、兰包、陇海

铁路客运的枢纽，兰州汽车东站是全省汽车客运中心。新建的兰州黄河大桥、黄河吊桥和古老的黄河铁桥，把黄河两岸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区内现有中央、省、市属中型工厂173个，主要有机械、冶炼、电子、纺织、制革、医药、食品、烟草、化工、建筑安装等行业。兰州水烟厂生产的“兰州水烟”历史悠久而闻名，畅销20多个省、市（区）。区属工厂43个，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正在兴起，1987年全区社会生产总值3.0339亿，财政收入1.5562亿。国营、集体、个体的各类商业网点星罗棋布，其中兰州百货大楼、民主西路百货大楼、酒泉路副食商场、悦宾楼京菜馆、张掖路新华书店、团结公司等10余处大型国营商店；兰州饭店、金城宾馆、胜利宾馆、西北宾馆、彩虹宾馆、东湖宾馆等大型饭店9处，一座高达86米总建筑面积为3.2万平方米设施完善的飞天大酒店，已经破土动工；区内辟有铁路新村，定西南路、永昌路等17个集贸市场和15处交易点。全区发展个体户11297户，从业人员达20087人。

农业生产以蔬菜、瓜果为主。全区有耕地41000亩，其中山地23711亩，川地17209亩。青白石乡的白兰瓜，是本区的特产，享誉中外，远销国际市场。本区瓜类专家何荣素培育的“金花宝”西瓜，1988年在全国西瓜产品评比中名列前茅，登上了西瓜王的“宝座”，其种籽已推广到15个省市。全区有奶牛场8处，奶牛2000多头，年平均产牛奶540万公斤。

辖区内现有大专院校7所，中学43所，各类中专、中技学校15所，小学102所。其中区属中学12所，中专1所，小学76所，幼儿园10所，已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有全国性科

研单位14个；大型公立医院7所，职工医院7所，各类卫生所300多个。中央驻甘和省、市新闻图书出版单位均在本区。有各种文艺团体9个，影剧院17个，公共体育场（馆）4个，少年宫1座，游泳池2个，西北最大的“甘肃省图书馆”1座。

五泉山公园、白塔山公园，峰峦叠翠，岩吐清流，浓荫回廊，极尽曲折，亭台楼阁，各就地势，飞檐云斗，琉金映日。雁滩公园军民共建南湖、碧波千顷，游船百数，柳细花繁，清雅宜人。宾河东路，花坛连绵，中缀儿童公园及小游园、石雕数处，游客如织。新辟兰山公园及重建的三台阁，尤具风格，登阁眺望，日近群山低，金城一眼收，嚣市足下，黄河东去，使人胸襟开阔，心旷神怡。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白塔、夏禹岣嵝碑、白衣寺塔、泰和铁钟、铜接引佛等名胜古迹，再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建筑艺术才能。“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和营盘岭两处革命胜地，展示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事迹以及人民解放军为兰州的解放所建树的不朽功勋。

王世相与“公车上书”

王勋业 王勋成

王世相先生，字说岩，世为兰州人，家居兰州贡元巷（今兰州市城关区贡元巷）。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生于兰州小金沟（今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小金沟村）。生来天资聪颖，专学嗜读，少年时期，就已名闻乡里，深得赞誉。二十岁中举，二十四岁联捷进士及第，历官知府，盐运使等。庚子（一九〇〇）之变，随两宫西狩。辛亥革命前，辞官居家养亲。民国成立后，曾充陇东护军使参谋等。在甘肃省第二届省议会期间（一九一八——一九二〇）被遴选为议长。一九二一年改署安肃（安西肃州，即现在酒泉地区）道尹，一九二五年病故于安肃（酒泉）官署。同年运柩原籍，葬于祖茔，享年五十有五。遗有诗稿一集，存诗三百来首。

先生一生经历了清、民交替时代那种战乱频仍，复杂动荡的岁月，所以他的思想也是矛盾复杂的。以辛亥革命为界，前期思想与后期思想表现形式不同。现在，仅就先生青年时期的思想表现与“公车上书”运动略述如下，兼及他事一二。

青年时代的王世相是一个豪情奔放，志不苟合，颇具锋芒而善恶分明的人，对清政府黑暗腐朽的政治，积弱积贫的落后现状是很不满的，激于民族义愤，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瓜分中国尤其深恶痛绝，感慨良深。他有改革现实的思想却

苦于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而乙未年的“公车上书”事件恰为他提供了一展宏愿的机缘。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即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三月二十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参加应都试的各省举人无不义愤填膺，悲痛扼腕。他们除纷纷上呈文与都察院请求皇帝废除条约外，还连日来聚集在宣武城松筠庵里（明爱国志士杨叔山故宅），举行声势浩大的声讨大会，到会一千三百多人，一致通过了由广东举人康有为起草的联名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十六省举人六百零三人，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由于这一事件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兴起，支解了清王朝闭关锁国因循守旧的思想体系，迫使有识之士，奋起图存，革新风潮漫卷神州，对伟大的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方面亦起了催化作用。所以现代著名史学家如范文澜先生等都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甘肃举人也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在康有为拟写的请愿书上签名的有六十一人之多，就入数来说，名列全国第五。此外，甘肃举人与其他各省举人一道，在这之前也曾有单独以本省名义联名公车上书之举。《公车上书记序》说：

“初则广东举人梁启超联名百余，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载各联名数十，首诣察院，呈请代奏。既而福建、四川、江西、贵州诸省继之，既而江苏、湖北、陕、甘、广西诸省继之，又既而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诸省继之。盖自三月二十八、三十、四月初二、初四、初六（一八九五年四月廿二、廿四、廿六、廿八、三十日）等日（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沓，言论

滂积者，殆无虚晷焉。

书上数目不报，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

(《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二册)这“十八省同上一书”指的就是康有为起草的请愿书。可见甘肃举人曾经向都察院上过一封“呈清代奏”的呈文，时间当在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初六之间。后来，甘肃举人李于锴又草拟了一封《请废马关条约呈文》，并联合了本省七十六名举人签名通过，“准备送到都察院，请求代奏。后来他们听到约已批准，事情已经无可挽救，才把已经写好的呈文搁置下来”(见李鼎文先生《甘肃举人请废马关条约的文献》，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则此呈文当于四月初六后才准备去送，而清政府恐人心汹涌，局势有变，于是便将原拟四月十四日(五月八日)在烟台互换的条约提前于四月初八(五月二日)盖印批准，李于锴所草的呈文就是这样被搁置下来的。这一情况恰恰说明了甘肃举人在“公车上书”运动中的表现是很积极勇敢、热情踊跃的，爱国热忱很高，他们为甘肃人民争了光。而李于锴更值得称赞，他很可能感到在仓猝中所拟已上呈的那封呈文，有言犹未尽之处，于是便又写了一封深刻地剖析了条约的弊言，坚决反对割地赔款，表现了对中国命运的深沉忧虑和关怀，其行动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

再看世柏先生与“公车上书”的关联——中日甲午(一八九四)战起，王世柏正由兰州起程准备经西安抵达北京参加翌年的会试。一路上马不停蹄，人不离鞍，为的是早日赶到西安探听战事进行的情况，因西安较兰州信息灵通。到西安后，便传来了中国战败的消息，他十分震惊悲愤。即到北

京，又听说清廷打算派李鸿章去与日本和谈。他素闻李鸿章是一个仰承洋人鼻息，唯洋人之言是听的洋奴，很担心和谈又会重蹈《中法新约》的覆车，因这一不平等条约正是李鸿章于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后在天津签订的。应试期间，果然传来了《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中国面临着又一次被瓜分豆剖的灾难。一时之间，群情激昂，广东、湖南会馆的举人首先发难，通过都察院向皇帝上呈文请愿。他听到后和甘肃会馆的举人也积极行动起来，连夜草拟呈文，联名向都察院递呈，还奔去参加松筠庵的聚会。他不仅在李于楷所写的《请废马关条约呈文》上签了名，而且在康有为起草的请愿书上也签了名。不难想见，这位年仅二十四岁，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为废除卖国条约而奔走于会内会外的活跃情景，亦可想见他时而挥臂陈辞，时而感愤吟诗，时而奋笔签名的慷慨激昂的情态。他与甘肃举人一道，在“公车上书”运动中表现了甘肃人民爱国忧时意愿，为甘肃历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毋庸置疑，“公车上书”事件对世相先生的思想发生很大的影响。此后，他便留意新学，想通过新学来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同时，“公车上书”对他以后的从政为官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如他在戊戌这一年擢进士后正值河湟之乱，清廷派董福祥领兵剿抚，他在董府的幕府中力主招抚而反对兵戮。后来在查办泾川窖店变案和“循化番案”中也不以镇压为能事，而以剖析利害得失，使肇事者均心服口服见称。他在官府，恪守以吏治为本、剔弊立法，力求做到振纲励纪，赏罚持平。这一切正如曾任清内阁侍郎的任承允为先生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说：“为议长以安全全省为心，遇事未尝随声附

和。”此话并非言过其实，而是世相先生为人处事之概括。

另外，在他的故乡里还流传着一些关于他爱乡惠民的事情。说他每次回乡或路径桑梓，必在村头下马，步行而入，有人劝他上马，他说：“至父母之邦，理应尊敬。”有贫寒而年长未婚者，他便出资令其完婚。遇有荒年灾月他便舍粥施米救济等等。也有人说这是地主阶级的虚伪行径，他们惯用小恩小惠拢络人心，沽名钓誉。这话原也不错。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有他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但是比起当时那些在政乱兵骄中观淫而渔的贪官污吏来，他毕竟还不失为一位有良心的廉正的封建官吏。更何况“求古同今”为史家所忌；对历史及历史人物，应历史的看待，免涉浮稚。

王世相的墓在小金沟，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被小将们挖出来剖棺暴尸，作为阶级教育的典型供人参观。具有一定文史价值的墓碑也被摧毁，至今仍被当作水渠桥板任人践踏，使之风化泐裂，无人过问。在抢救史实，珍惜文物之今日，这些无知表现，实在令人费解。

一九八八年六月

